

第一章

隙缝经济和中国的现代化

第一节 引言

在常见的中国研究中，关于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基本上只是中国目前发展趋势的延推。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真的能够保持下去吗？对此有许多否定的观点，例如西方保护主义对中国发挥其在水世界经济分工中的潜力的限制作用 (Langhammer, 1995)，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源和基础设施的瓶颈 (Smil, 1993) 等将可能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但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尽快地实现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对于中国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实质性意义。这里的原因是，外国直接投资除了能够缩小中国资本缺口之外，还是中国引入比如环境保护技术的基本途径 (Song, 1995)。

资本输入的决定性条件，无疑是政治稳定和起码的法律保障。随着中国在这方面的不断进步，那些对下一世纪中国食品

形势的悲观估计便值得商榷（*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5）所以，对中国的各种乐观估计都假定，如果中国的经济和制度进一步与世界经济相融合，中国就能够发挥自己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此，我们不仅要强调“文化冲突”的冲突和矛盾方面，也要注意它的另一方面，即中国与世界的整合。到目前为止，这一整合仅仅发生在世界华人文化圈内。这样的整合给这些华人提前带来了文化一体化的好处。洛杉矶的台湾地区商会便是这种整合的体现。该会通过在美国、中国内地及台湾、香港地区的投资，实际上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并最终使文化冲突论不攻自破（*Prybyla*, 1995）。与此相反，在中国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价值观存在冲突。所以，在中国乡村，存在着各种各样社会和经济问题，使得迅速的社会变化较难管理和控制。

在本章中，我考察的问题是：中华文化圈的内部整合对它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具有什么意义。中华整合是制度性的，并要通过一定的体制来实现，中国文化传统本身是体制的基石之一。我之所以强调体制，是因为它们不仅对资本的全球流动，而且对一国的创新潜力和竞争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Cimoli, Dosi*, 1996）。但是，有效率的制度，不能通过国家来建立，因为国家本身只是整个国民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从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相同性原理出发，文化包括了政治和经济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我将把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置于漫长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来考察（*Herrmann-Pilath*, 1994a）。

传统和国际化往往被视为两个对立的观念。中华传统经常被当作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即封建制度的同义语。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但最终要被消除。消除中国传统结构的进程由于

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等原因而延缓了。在长期蒙受西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耻辱之后，中国现在通过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取得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便是民族目标的实现。其中，现代化也意味着农村和一些旧的传统转变。实际上，国际化和现代化之间有各种联系。比如，外国资本流入中国沿海地区，便是中国内地人向沿海流动的一个原因。对内地人来说，沿海的生活是一种崭新的世界。以后，外流者又返回内地家乡经商，从而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1996）。

研究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关系，首先应当澄清概念。本书所指的传统，不是指中国人长期信奉的“儒学”，而是指价值标准，指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传统，不是新儒家的哲学观，而是指大众的精神信仰和日常处事标准。对于精神信仰，只有历史地证明了它确实能够影响大众的日常处事标准，我们才研究它（*Chen Lai, 1995*）。按照这样的理解，社会传统和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很模糊。例如，目前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过去已被人们摒弃的传统习惯反而增强了，像在一些地区的看“风水”，或者建庙进香。海外华侨也经常出资，回家乡修庙建寺。

在科学的文化分类学中，尤其在中国的文化分类学中，世界被静态地划分成不同文化区域，“西方”和“东方”文化被对立起来。这是一种“文化形态学”的误解。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们必须强调现象学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观，在生活世界观中，像“理性”和“本能”这样一对概念完全没有用处。而这样的概念，往往被受儒家影响的学者用来比较东西方文化，甚至用来把东西方文化对立起来。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所理解的“现代化”里，传统与经济

变革的关系很清楚。实际上，它们的关系很难表述清楚（Yang Kuo-shu, 1989）。详细地说明这里的困难也不容易。问题的关键是，不要从哲学与世界观的角度去考虑它们的关系，而应当寻找出具体的研究客体，来观察传统与现代在实践中的相互作用。一个理想的研究客体，既应当包括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应当包括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例如，乡村工业符合这两个研究要求。就生产的组织形式、科学技术和生产率来说，乡村工业在村落文化里，开展了经济的现代化。也正是这些乡村工业，在一些地区内，与外资（包括华侨资本）紧密合作，体现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所以，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乡村工业是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结合点。但在作为本书引论的这一章里，我们试图更广泛地考察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本章考察的是中国现代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联系，或者它们是否会互相独立。

第二节 粗放型增长和隙缝经济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克曼（Paul Krugman）认为，亚洲的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奇迹”，而是一种以增加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外延型增长。他的看法在华人圈内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Krugman, 1994; Fan Gang, 1996）。但中国恰好为克鲁克曼的观点提供了依据。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每次经济增长波，都与制度改变导致的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清晰的相关关系。比如1978—1984年的第一次增长波，是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1992年之后的第三次增长波，则源自大量的外资流入和农村释放出的大量流动劳动力。由于中国在

改革前，最重要的，也是它最富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严重闲置。所以，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制度改革，都显著地改变了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

根据我的看法，克鲁克曼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做的这种定性估计，不一定需要定量分析作依据。克鲁克曼在扬格（Young）之后做的以及世界银行做的有关定量分析，也不能作为依据。后一个定量分析发现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对中国经济增长得出了较为正面的估计（World Bank, 1996）。对待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的经济计量估计，要格外谨慎。更重要的是，经济计量估计必须具有足够长的时间序列数据。但在中国，不但过去数据的可靠性低，而且要素市场的制度结构今天与 80 年代中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要素总体生产率估计的方法论基础，即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很难应用于过去的中国。这意味着，在中国，用国民收入分配数据来衡量不同生产要素对于社会总产值的贡献，是毫无意义的（这一观点即使对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也是适用的）。但是，不用这种衡量方法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经济计量估计方法（如线性齐次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就不可能利用估计方程，证实或者反驳克鲁克曼关于亚洲经济现代化的粗放论。

毋庸置疑，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实行的商品市场“价格双轨制”，使市场过程成为经济地确定边际量的决定因素。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要素市场还不是这样，或者说要素的市场机制才刚刚露头。因此，关于中国要素收入的边际变动，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实际上，中国国民收入的工资份额，没有包括经济增长地区的第二、第三工资收入。因此，我认为，所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定量估计，都囿于敏感性分析不足，也就是说，在可利用的数据基础上，相互对立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

论，会仅仅由于数据的改变而大幅度地重合，并使据此而得出的推论本身失去分析价值。

所以，克鲁克曼的论点只能从定性的角度加以讨论。他的论点的要害是，在大部分东亚地区，制度、组织和技术现代化与已经达到的经济水平不协调。事实上，这是他的论点在中国得到持续注意的根本原因。当然，克鲁克曼对东亚包括中国现代化的前途提出了疑问，也间接地对所有试图通过在数量上外推现今中国的增长趋势，以预测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做法提出了疑问。

讨论到现代化、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克鲁克曼的论点与近来中国经济史文献内的“过密型增长模式”直接相联系（Huang, 1993），从而把我们的讨论主题与许多中国学研究成果广泛地联系起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里，人们以几乎相同的方式不断地论证，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市场经济，虽然能有显著的发展，但最终总是陷入了外延型数量增长的死胡同。所以，中国存在着强大的遏制质量型增长的内在阻力。晚清时期的中国传统经济终究没有能力实现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创新（Elvin, 1973; Chao, 1986）。有趣的是，在黄宗智的模式里，由于中国当时的资源和人口比例，繁荣的市场经济恰好形成了中国最优的增长模式。然而，正是这种增长模式导致了技术停滞和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稳定。在这种原有社会组织形式内，原始团体如家庭内部的再分配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本世纪 70 年代末。只是 80 年代的乡村工业化，这种循环才被打破。黄宗智认为，正是乡村工业化的地方干预主义特征，对新增长模式的开创，起了关键作用。这意味着，乡村工业没有在完全的私有制下发展，反倒使本来阻碍现代化的中国市场过程，成为积极推动真正现代化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乡村工业明显地处于“正式”经济体系之外。在这个意义

上，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二元的。此外，历史的偶然因素，对乡村工业的突出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比如中国 80 年代中期猛烈的信用扩张，或者像上海与江苏这样的地区间协作。不过，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有许多农村地区的乡村工业化没有突破旧的模式。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最近 20 年来中华文化圈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我们将会发现，诸多方面的历史巧合不断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准确地说，华人企业家适应特定世界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强烈的主动性，是中华文化圈崛起的持久动力。华人长期以来在亚太区域迁移这一历史事实，对此也常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这种巧合。例如，当今海外华人的富裕，正是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对华人经济采取歧视政策的结果，这看上去是一种悖论（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1995;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5）。以往，华人经济始终被限制在经济活动的隙缝内，但后来，这些隙缝却成了特别盈利的部门。在菲律宾，华人长期以来不得插足核心工业部门，但华人在菲律宾银行业的主导地位却因此而产生了。同时，各国不允许华人在社会和政治上发展，华人只能通过经济上的成就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因此，华人文化圈内的经济发展实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隙缝经济”的发展。这里，隙缝经济的发展既描述了社会经济整合的程度，也隐含着社会正在发生的专业化过程。所谓隙缝经济指的是在一个具体的经济制度里，基本上处于正式经济结构之外的、以特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企业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而企业之所以可能专业化，首先是因为企业在正式制度之外活动，能够运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能够取得特殊的交易成本优势；其次是因为某些市场还没有被其他企业系统地开发出来。专业化的一个标准模式是企业非正式金融部门的专业化。众

所周知，发展中国家里存在着金融抑制。一方面，对信用需求过度；另一方面，官方经济以外的金融交易，则首先以交易者的相互特殊信任为前提。

华人企业在隙缝经济内的扩张，像是一种悖论，不仅适合于散居在外国的华人经济，也适合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台湾地区经济的二元结构表现在外省籍台湾人（内地迁台居民）和本省籍台湾人（台湾本土人）之间。本省籍台湾人只能通过经济业绩来实现其社会地位的提升（Chang, 1994）。台湾当局对他们的歧视一直渗透到狭义的经济政策中。台湾当局的现代化理念，只是在后来，才把本省籍台湾人的中小企业视为经济发展中一个积极和平等的因素。而在这之前的长时期内，台湾当局所信奉的现代化理念，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基础，认为台湾当局本身必须站在现代化的最前列。外省籍台湾人和本省籍台湾人之间的二元结构，在台湾割裂的资本市场上体现得比较清楚：一方面，本省籍台湾人的企业完全被排挤进一个“次文化”——与社会文化脱节的灰色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大银行则主要服务于部分地在日本侵占时期就形成的国营企业和大企业。

事实上，大部分本省籍台湾人的企业，当时存在于隙缝经济里，尽管隙缝经济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经营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正是依靠这些特性，台湾地区的企业今天才去开发祖国内地的经济。他们长期生存在受歧视的资本市场内，炼成了特殊的筹资能力。这是他们开发祖国内地经济的有利条件。

如果把隙缝经济观点推广到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的部门——乡村工业内，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乡村工业活跃于现有的国家体制之外，其能量来源于特定的专业化发展。一方面，正式经济体系内的管理制度，如有关劳动条

件亦即劳动要素成本的规定，几乎都涉及不到乡村工业；另一方面，许多乡村企业与国家企业建立了某种互利协作关系。从国家企业利益出发，把技术和其他重要原材料用于正式体系之外，即提供给乡村企业，可能对自己更有好处。同时，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商品的运输成本很高，由于许多市场被计划经济下的国有部门长期忽视等原因，中国经济内存在着大量空隙，这就给乡村企业提供了生存的天地。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资本在祖国内地的企业。这些企业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准。也就是说，中国因此而取得了技术转移的一次性推动力。显然，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技术进步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克鲁克曼的论点之间的联系。资本来源地的传统出口工业，为了适应改变了的竞争条件所作的调整，是大部分华人资本流向祖国内地的主要原因。一个常常提到的例子是，台商把制鞋工业转移到祖国内地，首先是为了粗放地利用祖国内地过剩的劳动力来扩大产量，与台湾企业的技术进步毫无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无论对流出地区还是流入地区，资本流动都不可能成为广义的经济现代化的持久动力。实际上，这些资本仅仅存在于隙缝经济中，而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来说，这些隙缝经济不可能促使他们在制度和组织上加以革新。

所以，迄今为止，如何评价中华文化圈内的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将带来的长期影响，仍然是众说纷纭。乐观论者从资本流动中看到了资本流出地区现代化的明确动力，认为这些地区最终将成为整个中华文化圈现代化的“火车头”（Lin, Chen, 1996）相反，悲观论者认为资本流出地区并没有创造出适当的投资环境，没有能把隙缝经济的增长转变为整个经济的增长。因此，技术停滞的危险继续存在。显然，略经修正，这些关于台湾地区的讨论，也适用于中国的其他地区。因为在那些地区也

存在着夹缝中的乡村工业快速增长而正式经济部门即国有经济却相对停滞的问题。

第三节 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 增长作为政府的任务

在东亚，不少学者持有上述悲观论点。他们经常指出，在国际竞争背景下，东亚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总是或早或迟要达到技术和经济创新的界限。为避免这个结局，他们特别强调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内的主导作用。所以，在东亚，对政府产业政策的持续要求和这一政策的实施，只是反映了这部分学者对不加调节的经济发展的悲观估计。

台湾模式从一开始便具有当局干预的特征。他们所信奉的理论是，没有当局产业政策的主导作用，中小企业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如今，台湾地区虽然实施了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比如银行体系的私有化，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但同时将继续奉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香港地区也有一些人呼吁强化当局的产业与技术政策，以缩小经济空壳化的影响，尤其是用这些政策来保护与扩大香港地区的商业技巧优势。香港地区的商业技巧对广东的产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肯定的是，在亚太地区的高科技领域里，香港地区的地位最差（*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5; Tsang, 1995）。

在中国，许多学者也认为，为防止市场经济下的增长陷入质量停滞甚至于倒退的死胡同，必须重新强化国家经济决策机构的职能，因为，只有财力雄厚的国家才能发挥其必不可少的产业调控作用（*Herrmann-Pillath*, 1995a）。

因此，华人区域的情形虽有区别，但它们的一致之处在于：一方面把当局看成现代化的必要动力；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是部分地置身于当局确立的制度和当局调控的市场之外的隙缝经济中。所以，当局不断地声称要加强对隙缝经济的调节，以推动现代化。

今天，我们在中国听到的许多对乡村工业的批评，认为这些部门存在着无效率的增长，只有国家应用产业政策才能克服无效率，并把这些部门的增长纳入真正的现代化轨道。中华文化圈内这样的或类似的观点，刚刚开始走下坡路。在台湾地区，这是“民主”过程的结果，也是那些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在当局机构发挥重要影响的结果。但在新加坡，类似观点还很占优势。而在香港，由于来自华南和上海的华人企业家和英国自由主义学说在文化上的结合，它才受到了抑制。相反，在中国，这种观点目前始终占上风。它还和加强中国在国际社会内的民族国家地位的政治要求密切结合在一起：经济政策即是现代化政策，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把中国变成富裕和强大的国家。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我想大胆地从一般历史的角度研究上述观点。这里，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隙缝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现代化看成矛盾现象。具体地说，一方面是财富，是由华人企业家用土地和其他被传统观点视为特别有价值的财产聚敛起来的财富；另一方面是看上去不可能消除的技术依赖性，即中华文化圈的经济依靠其他文化圈的技术输入，例如台湾地区的技术依靠日本，当然也依靠美国。

考虑上述矛盾，我们始终可以体会到，中华文化圈内任的市场经济动力，总是传统的动力，如乡村的、家庭的动力。20世纪中中国的现代化纲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只有当所有这些传统因素失去作用之后，社会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Cohen P. A. . 1988）。

“现代化”和“传统”的矛盾，如今在中国表现得特别尖锐。这一矛盾始终与国家控制经济发展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简单地说，国家的任务是把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直接引入现代社会。传统的封建制度的残余一直是现代化的危险。现代化即意味着国家，现代经济增长即意味着国家干预。

华人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相信中华传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障碍。这种信仰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1949年以来，中国在经济政策上有过各种观点，但不管怎样，上述信仰才是真正的理由，说明中国为什么总是不把农村的内在发展动力置于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目前中国对迅速扩大的农民流动也这样看待。中国不断地把传统因素确认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例如，人们一直认为，按家庭规则实行的分田方式阻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因此属于传统因素。这种批评和对家庭企业的批评完全一致，因为子女继承时的分家析产，会缩小家庭企业的平均规模（Zhu, 1995; Wong, 1988）在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之前，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消费模式不利于积累生产性资本；传统家庭企业是次优的组织形式，仅仅在某些部门如小的房地产和建筑企业有竞争力。此外，传统的赠与和交情导致了腐化和帮派，后者则恶化了投资环境。

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观点里，中华传统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竟然没有一点创造性和积极的作用。传统的积极因素几乎只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儒学”和他们重新构织出的传统。这些知识分子自诩为民族文化的承担者。他们把自己构织的传统夸大成“后儒学”，还推行到西方。其实，他们把传统区分为“好”和“坏”，把坏传统视为封建传统，便至少隐含了国家的主导作用。但是，一旦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激进现代化的思想相结合，他们就陷进了自相矛盾之中。同时，根据他们的

观点，中国需要用人造的“现代”代替“坏”传统，因此他们刺激了关于中国国家和文化特性的无休止的讨论（Fitzgerald, 1995）。所以，在中国，民族主义和经济干预政策经常结合在一起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数百年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的传统上，因为这个传统根本无法想象亚当·斯密的经济自我调节机制（Zhao Jing, 1986）。

第四节 国家主导型现代化的问题： 文化经济圈和民族国家经济

根据上述现代化和传统的关系，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现代化必须放弃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中华传统，而这些中华传统恰恰促成了隙缝经济的繁荣和华人企业的昌盛。在中国经济圈内，隙缝经济至今也是超越现存政体界限的经济和文化整合的真正中介。这一点可以从香港与广东的整合过程中看出。因此，从中国的角度考察，隙缝经济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成为 19 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另一个焦点。

对现代化的解释，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中国实际的传统，即看中国传统有没有可能变成经济现代化的手段，看它能不能形成另一种国家、民族与文化关系。换句话说，从隙缝经济的实践里产生出来的现代化，是否能够造就另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隙缝经济是否能够产生出与常见的民族国家标准不同的整合模式。具体地讲，这个问题触及到目前中国社会整合功能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城市和乡村的文化整合，也就是克服经济的二元性；二是中华文化圈内的政治与社会整合。

现在我们仍然回到经济问题上。如果再一次考虑克鲁克曼

的看法，就会发现他所涉及的，显然是植根于中国实际传统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规范会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这也就是建立有效的知识密集型的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保持企业活力和在世界经济内发挥创新能力的问题。如果经济计量分析有助于理解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则对上述这类问题的解释，都需要用经济计量分析找出具体国家总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变化 (Abramovitz . 1989)。

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实质就是中国能否产生一种知识密集型并充满活力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这一结构将是中华文化圈不断提高自己国际竞争力的基石。而在这里，一定文化传统对企业的行为模式具有突出的作用 (Ikegami, 1995)。

下面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第一个例子是知识密集型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内出现的信息加工方式有一定特点。简单地说，这些特点一是把信息当成权力，二是把信息当成私有物品尽可能地加以保护 (Redding, 1990)。例如，与其他企业相比，海外华人企业极少求助于知识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如咨询企业。在华人企业内部，信息也大多被集中和垄断起来。这不但给企业发展带来许多困难，而且妨碍了决策阶层的工作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1995)。

不过，我们在这里又碰到了鸡和蛋的问题。一方面，企业长期生存于法制不健全的状况下，他们的信息模式正是适应这种环境的产物。我们强调这一点，因为正是在它的另一面，现存的社会结构又有能力通过“信任”来维持经济活动的稳定 (Kao, 1991)。各华人企业之间能够非常灵活地开展协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网。这一点在前几年的研究里受到了重视。但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外部存在着大量可利用的信息 (Lee, 1995)。它表示，尽管每个企业用正式的组织结构把信息

垄断起来，但通过各个企业家即企业所有者之间的个人关系，这些信息却能够在企业间互相交流。这里显示出的是市场和等级制度的特定结合。而前面提到的对传统企业在信息交流方面缺陷的分析，仅仅片面地注意了等级制度。

事实上，上述信息模式存在于中华文化圈内的每一地区。例如，在中国，乡村企业与国家组织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个人关系网，是他们获得技术和信息的关键（Yang Mu, 1994; Hu Bil-
iang, 1996）。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看上去矛盾的信息模式，既与等级制度，也与融合在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里的信息流有关。在等级制度或多少非人情化的交流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交流障碍。但在以不同方式人情化了的交流关系里，这些障碍则不存在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此时，即使双方信息有多有少，双方仍然能够在信任的基础上平等地交换信息。双方越是相互信任，就越不会计较短期内的交换平衡。

这种现在被称为“网络”的制度，被只关心等级制度或者只关心市场的经济学排除在外（Grabher, 1993a）。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不是华人特有的，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与此类似，英语中的“Embeddedness”可算是和特定的文化无关的概念。但是保证网络稳定的具体机制却主要取决于各民族的历史。如果我们追寻华人经济特有的信息模式的起源，根据我的看法，它有两个不同的起源。

第一个起源是前面所讲的隙缝经济文化或经济灵活性文化。在这样的经济文化里，正式机构常常不可靠，在一些移民迁入区正式机构甚至起着副作用，所以人们也有意识地不去健全它。这时，非正式的信任机制便长久地起着作用。与此有关的第二个起源是华人传统，包括“大”和“小”的传统。从特别的感情用事到注重社会关系，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华人调节人际关系的传统行为模式（Bond, 1996）。在本章内，我想着重强

调的是与国家和社会关系密切相关的一部分传统。

如果观察清末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非正式信任机制和非正式的经济协作是长期的主导趋势。在国家与社会的交点上也同样如此。中国与欧洲大陆各国不同，缺乏军备预算的压力，国家建立和保障的正式机构正在弱化。当然，这里出现的还不是隙缝经济和官方经济的二元性。更可能的是，清代经济和社会的整体结构特征，后来成了中国隙缝经济的规范基础。

我认为，把晚清的长期趋势仅仅看成清代内部崩溃的标志或者清代社会经济结构“封建化”即退化的标志，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看法来自于“现代”和“传统”的二元论，来自华人 20 世纪内所有重要的现代化纲领的激进反传统的特征。下述事实极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天的封建主义概念最初是褒义的，指的是强化地方法定权力，即建立自下而上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封建主义的概念在后来的发展中，包括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其中肯定也包括了通过长久稳定的人际间信任而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秩序。这种传统秩序现在便存在于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即隙缝经济中。

有关中国晚清时期经济社会史的文献，经常把非正式机构的发展称为“私人化”的长期趋势，即国家机构在社会中作用大幅度降低的趋势（Kuhn, Mann, 1985）。在中国社会非国家化的同一时期，崛起的欧洲各国正在“国家化”。19 世纪中期，这两种相反的世界历史趋势发生冲突，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国家化原则获胜。欧洲获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欧洲各国政府根据这个原则，把民间资源汲取到国家财政，从而建立了强大的军备力量（Herrmann-Pillath, 1992a）。这样，中国本来的发展趋势就被打断了。所以，对晚清时期社会经济趋势的重新评价，可以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当前中国的发展状况。正是在这一点上，我

们可以把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不同想法联系起来。例如，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家庭企业间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是否效率很低，因此国家就应当用产业政策来干预呢？我们已经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正是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的根据，也是当前中国加强中央财政力量的理由。据说，政府有调控产业政策的能力，应当也对乡村工业实施产业政策。这里的理论依据是，原则上，地方和个人的灵活性与活力虽然能在中、短期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他们在知识积累和加工上的缺陷，将使长期的经济增长陷入死胡同。就此而言，在现代化、国家发展和企业活力与竞争力三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过，这些联系经常被掩盖了。

简而言之，我们的讨论总是明确地揭示出中华文化圈的矛盾：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与国家调节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具有传统和最终停滞趋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文化圈。

在这两个二元概念中，有没有第三个概念可供选择呢？晚清时期的非国家化趋势能够在目前中国的现实里再次发现吗？这个趋势已经消失于隙缝经济之中了吗？事实上，最近在亚洲出现了一些新看法，自称发现了我们所谈的中介，并甚至把它看成世界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比如民族国家要消亡，国民经济标志的国家界限要撤销，开放的地方主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跨国公司僵硬的等级制度是企业创新的障碍等。不过，这些看法与闻名的“东亚模式”有很大差别。比如，如果民族国家要消亡，它就会失去产业调控的能力。整合也不再仅仅是国家层次的整合，而是地区的、功能性的和文化的整合。多视角的地区和全球的“网络社会”将取代单视角的民族国家。

管理学家虽然起劲地鼓吹这些看法，但他们不了解历史。就中国来说，我们现在必须确认，经过 20 世纪的深刻变革之后又重新出现的“非国家化”趋势，实际上源自于晚清时期的传统